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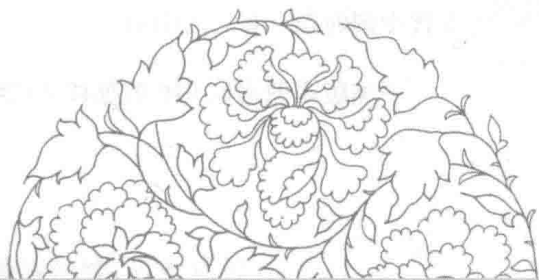
隋唐五代 量词研究

SUITANG WUDAI
LIANGCI YANJIU

李建平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隋唐五代 量词研究

SUITANG WUDAI 李建平 著
LIANGCI YANJIU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 李建平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09-10289-6

I. ①隋… II. ①李… III. ①古代语法—数量词—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②古代语法—数量词—研究—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6561 号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李建平 著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推 广 部 (0531)82098029
(0531)82098025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18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10289-6
定 价 3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序

数量范畴是世界语言所普遍存在的语法范畴,但发达的量词系统却是汉藏语系、南亚语系中的量词语言所特有的;量词丰富也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量词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刘世儒先生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的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其专著《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为汉语量词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活跃,汉语量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古代汉语量词发展史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汉语量词断代史研究专著的缺乏,一直制约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隋唐五代时期是量词系统从魏晋南北朝的大发展走向初步成熟的重要阶段,学术界对这一阶段的量词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总体来看仍然缺乏全面的断代史研究成果。

本书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两汉量词研究》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量词系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获得了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可以与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一起构成从隋唐以前量词发展史的序列。作者笔耕不辍,在博士后工作与研究过程中又完成了《隋唐五代量词研究》一书,并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再次推进了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的深入。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有言:“一时

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该书作者长期从事汉语发展史和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特别注重新材料的利用,在研究中能够贯彻“二重证据法”,将出土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互证,因此该书语料不仅采用了全隋文、全隋诗、全唐文、全唐诗、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等大量传世文献材料,而且特别注重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社会经济文书、隋唐五代碑刻文献等出土文献材料,对隋唐五代时期浩繁的文献资料逐一进行了整理与考察。仅从作者所调查的语料来看,就可知该项研究的工作量之大及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

该书第一次对隋唐五代时期的量词系统进行了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逐一考察了411个量词在隋唐五代时期的使用、发展和语法化情况,其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个体量词150个、集体量词76个、借用量词79个、制度量词59个、动量词47个,完成了对隋唐五代量词状况的共时描写;并能够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将每一个量词置于汉语量词发展史的框架中展开历时考察,分析了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系统的历史层次;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系统的特征,并探讨了隋唐五代时期量词与中心词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等问题。

对于传世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刻文献等出土文献的综合利用,可以揭示更多汉语史中此前研究未能发现的问题,例如量词“枚”在两汉时期获得了广泛应用而发展为泛指性量词,到隋唐五代时期随着新兴泛指量词“个”的兴起而衰落,从传世文献如《全唐诗》来看用例罕见,甚至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衰落趋势,但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中却仍然广泛使用,反映了泛指性量词兴替过程的复杂性;又如刘世儒先生提出量词“事”始终没有发展为典型的量词,而敏春芳、郑绍琳等学者先后据敦煌文书和石刻文献指出“事”其实是唐代常见的典型量词,而事实上不仅出土文献,在《全唐文》“事”作为典型量词的用例也是很常见的。

该书还以体现目前辞书编纂最高水平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作为参照系,从提前书证、增补义项、修正释义、提供书证等方面展开考察,总计对其中的37个词条进行了订补,增强了大型辞书释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汉藏语系量词语言中的量词系统往往都不是先有的,而是从名词、动词等其他词类语法化而来,因此量词语法化的动因与发展机制也是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重点之一。汉语量词系统早在甲骨文时代已经产生,直到现代汉语仍在不断发

展,丰富的文献为量词系统语法化过程和动因与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因此,该书不仅可以填补隋唐五代量词断代史研究的空白,同作者对先秦两汉量词研究成果与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一起构建起量词断代史研究的序列,而且可以为汉语乃至汉藏语系量词的语法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作者长期以来致力于汉语量词发展史及其语法化方面的研究,先后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并多次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经济史》等全文转载以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主体转载,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并且,作者先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研究都有相对集中的目标领域,与学术论文相得益彰,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反响,构建了良好的学术版图,假以时日,相信作者可以在语言学研究上有较好建树。

纵然本书如著者所言成文仓促,但仍可见年轻人的赤子之心,作为老师,我鼓励他的每一次勇敢尝试。未来的学术道路还很漫长,希望作者能以此著作作为良好开端,坚持读书治学之路,在学界做出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张文国

丙申年十一月于千佛山下

目 录

- 序 / 1
- 绪 论 / 1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 二、隋唐五代量词研究的展望 / 6
 - 三、隋唐五代量词的界定标准和分类 / 6
- 第一章 个体量词研究 / 10
- 第一节 泛指类个体量词 / 11
 - 第二节 外形特征类个体量词 / 15
 - 一、线状量词 / 15
 - 二、点状量词 / 28
 - 三、面状量词 / 34
 - 四、块状量词 / 40
 - 五、动状量词 / 41
 - 第三节 非外形特征类个体量词 / 48
 - 一、替代型量词 / 48
 - 二、凭借型量词 / 58
 - 三、专指型量词 / 66
 - 第四节 隋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历史层次与特点 / 103
 - 一、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个体量词 / 104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个体量词 / 105
 - 三、隋唐五代新兴的个体量词 / 105

四、隋唐五代个体量词的特点 / 106

第二章 集体量词研究 / 108

第一节 外形特征类集体量词 / 108

一、动状集体量词 / 108

二、丛簇状集体量词 / 120

三、线状集体量词 / 123

四、其他集体量词 / 126

第二节 非外形特征类集体量词 / 129

一、定指集体量词 / 129

二、非定指集体量词 / 132

第三节 隋唐五代集体量词的历史层次与特点 / 144

一、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集体量词 / 145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集体量词 / 145

三、隋唐五代新兴的集体量词 / 146

四、隋唐五代集体量词的特点 / 146

第三章 借用量词研究 / 148

第一节 饮食用具类借用量词 / 149

一、酒水类量词 / 149

二、饭食类量词 / 157

第二节 附容处所类借用量词 / 161

第三节 其他类借用量词 / 165

一、泛指类量词 / 165

二、竹器类量词 / 166

三、中医类量词 / 168

四、其他类量词 / 169

第四节 隋唐五代借用量词的历史层次与特点 / 174

一、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借用量词 / 174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借用量词 / 175

三、隋唐五代新兴的借用量词 / 175

四、隋唐五代借用量词的特点 / 176

第四章 制度单位量词研究 / 177

第一节 度制量词 / 178

第二节 量制量词 / 181

第三节 衡制量词 / 186

第四节 面积量词 / 189

第五节 布帛量词 / 191

第六节 货币及其他量词 / 195

第七节 准制度量词 / 198

第八节 隋唐五代制度量词的历史层次与特点 / 201

一、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制度量词 / 201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制度量词 / 202

三、隋唐五代新兴的制度量词 / 202

四、隋唐五代制度量词的特点 / 203

第五章 动量词研究 / 204

第一节 专用动量词研究 / 204

一、通用动量词 / 205

二、整体动量词 / 207

三、空间动量词 / 211

四、持续动量词 / 214

五、短时动量词 / 216

六、伴随动量词 / 217

第二节 借用动量词研究 / 220

一、器官动量词 / 221

二、工具动量词 / 221

三、伴随动量词 / 223

四、同形动量词 / 224

第三节 隋唐五代动量词的历史层次和特点 / 224

一、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动量词 / 225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动量词 / 225

三、隋唐五代新兴的动量词 / 225

四、隋唐五代动量词系统的特点 / 226



第六章 隋唐五代量词总论 / 227

第一节 隋唐五代量词的语法特征 / 227

一、句法特征 / 228

二、词法特征 / 231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数量表示法 / 237

一、物量表示法 / 237

二、动量表示法 / 241

第三节 隋唐五代量词与中心词的双向选择 / 244

一、同一中心词与不同量词的搭配 / 244

二、同一量词与不同中心词的搭配 / 248

第七章 隋唐五代量词的历时发展 / 251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汉语量词的发展 / 251

一、量词数量的发展与趋于稳定 / 251

二、量词语法功能的发展与初步成熟 / 252

三、量词语法化的发展 / 253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汉语量词发展的局限性 / 254

一、名量词系统的局限性 / 254

二、动量词系统的局限性 / 255

第八章 隋唐五代量词在历史词汇学中的价值研究 / 257

一、提前初始例 / 257

二、订补释义 / 262

三、提供书证 / 263

四、增补义项 / 263

附录 疑似待考量词 / 266

主要引证文献 / 270

主要参考文献 / 271

后记 / 275

绪 论

具有数量众多、用法复杂的量词是汉语乃至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诸多量词语言语法的重要特点之一,长期以来量词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经过前人和时贤的长期努力,目前语言学界在汉语量词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可谓辉煌的成就,在中国知网中以“量词”为篇名进行检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已经达到1600多篇^①,与量词研究关系密切的数量表示法与称数构式研究、语法化研究、认知和功能研究等,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

关于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刘世儒(1965:3)曾说过:“对于汉语量词史的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汉语量词,历史悠久,材料浩繁,全面地进行研究,这显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办到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尽先来作断代史的研究。我以为,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儿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30余年的量词研究史,也充分证明了刘先生的远见卓识:断代史研究应当成为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的基础和重中之重。但是,从1965年刘先生完成第一部汉语量词的断代研究专著

^① 笔者按:这一统计已经人工排除了虽然以量词为题但与语言研究无关的论文,如数学领域的全称量词的研究等;也不包括与本文无关的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量词教学策略研究等非语言本体研究的论文。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虽然为汉语量词研究、特别是量词断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然而40年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量词断代史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也正成为进一步量词语法化研究的障碍。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是汉语量词的萌芽时代，两汉时期则是汉语量词从产生到成熟的最重要的发展时代，笔者的博士论文《先秦两汉量词研究》全面整理与考察了这一时期的量词系统，完成了先秦两汉量词断代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系统初步成熟的阶段，刘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对这一时期的量词系统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隋唐五代时期是汉语量词初步成熟的阶段，但是由于隋唐五代文献浩繁，数量众多，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目前还没有全面系统的量词断代史研究成果问世。通过对隋唐五代量词的断代史研究，可以同先秦两汉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起，共同构建起汉语量词从萌芽、茁长到发展、初步成熟的较为系统的发展史序列，而且对于进一步探讨汉语量词系统，乃至汉藏语系、南亚语系等量词语言中量词系统的产生及其语法化动因与机制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书试图借鉴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对隋唐五代时期文献中的量词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进而对隋唐五代量词系统作一断代史研究，并将其置于历时的框架中探讨其时代特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在古代汉语量词研究中学界往往对上古时期的研究更为重视，因此对于上古汉语中量词的专题、专书研究的成果特别丰硕，而对隋唐五代时期文献中量词的研究相对就要薄弱得多。

（一）专题研究

所谓专题研究是对某一专题的系统深入研究，对于量词研究而言往往是对名量词，特别是其中最能体现量词语言语法特点的个体量词和动量词等子类的专门研究；对特定时代下特定专题的研究，使得量词发展史的研究更为深入。

1. 关于名量词研究

名量词是汉语量词类系中的第一大类，数量众多，用法复杂，也是汉语量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其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个体量词的研究，更是量词语法化动因与机制研究的重中之重。赵中方《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1991）、《唐五代宋元集体量词的发展》（1992）两文参照刘世儒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分别对唐五代时期的一些个体量词进行了探讨，指出其应用范围、语法功能方面的新特点。王向毅《名量词在唐代的新发展》（2007）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唐代量词

系统同魏晋南北朝量词系统展开对比,分类探讨这一时期量词系统的发展及其语法特征。王绍新的《唐代诗文小说中的名量词运用》(1990)则对唐代诗文、小说等文献中的名量词运用情况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了量词系统在唐代的新发展。王绍新《隋唐五代的一组称人名量词》(2004)对隋唐五代时期称量“人”的五个名量词“人”“口”“员”“辈”“众”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其语源及其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展情况,并从历时的层面考察了其流变。

总体来看,对隋唐五代时期名量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诗文,相对于隋唐五代时期数量众多的文献来看还有大量材料需要进一步展开系统研究,需进一步扩大量词研究的资料范围。

2. 关于动量词研究

相比名量词研究,隋唐五代时期动量词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少。王绍新《从几个例词看唐代动量词的发展》(1997)对《全唐诗》中的动量词进行了穷尽性全面统计研究,并以刘世儒(1965)对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的研究作为基础展开比较,对唐代新兴动量词和有了明显发展的动量词进行重点研究,探讨唐代动量词系统的发展及其地位。曲建华的《唐代动量词探析》(2011)则调查了《全唐诗》《全唐五代词》《敦煌变文集》《游仙窟》《唐语林》《大唐新语》《玄怪录》七种文献中的动量词使用情况,并详细统计了动量词的使用频率,探讨了动量词系统在唐代的新发展,如使用频率的提高、新兴动量词的大量出现、动量词的叠用等,同时指出不用动量词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其他相关研究论文还有李建平的《唐五代动量词初探》(2003)等;金桂桃的专著《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2007)中对这一时期的动量词发展也有涉及与研究。

(二) 专书研究

从专书研究来看,对上古时期的重要文献如《诗经》《尚书》《左传》等经典文献中的量词系统研究成果众多,而隋唐五代时期文献的量词研究则相对就要少得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孙艳(2006)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名量词系统进行研究,同时也考察了“名+数+量”结构、“数+量+名”结构、“数+名”结构、“名+数”结构等称数构式在该书中的使用情况,对部分构式也进行了数量统计。叶松华《〈祖堂集〉量词研究》(2006),对《祖堂集》中的量词分类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统计了每个量词的出现频率和适用范围,探讨了其语法功能的发展。

(三) 出土文献量词研究

在语言研究中,相比传世文献而言出土文献由于没有辗转传抄、校勘中的纂

改,具有更强的文献真实性,也更具有语言研究的价值。因此近年来出土文献的量词研究特别得到了重视,对隋唐五代出土文献中量词研究的成果也更为丰硕。

对隋唐五代出土文献量词研究的代表作品是洪艺芳的两部专著《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之量词研究》(2000)和《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之量词研究》(2004),作者对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量词及其称数构式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地考察。^①洪氏二书是目前对隋唐五代时期出土文献的量词研究最为系统、深入的著作,既有对所研究文献中量词共时的逐一细致描写,又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作历时分析;对量词及其称数构式的使用频率往往也有准确统计,同时还讨论了量词与中心词的双向选择关系、量词书写过程中的不同形式及其关系等问题,是目前古代汉语量词研究中的又一典范之作。

曹芳宇的博士论文《唐五代量词研究》(2010)则对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世俗文献的量词系统进行了全面考察与研究,同时兼及唐五代史书、诗词、语录、笔记小说等传世文献,对349个量词(其中名量词318个,动量词31个)逐一考察分析。其他研究论文主要有李日辉《〈敦煌变文集〉量词重叠的语法分析》(1982)、李思明《〈敦煌变文集〉中的量词》(1983)、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新兴量词考》(1990)、周春梅《〈敦煌变文集〉的称数法》(1991)、王建军《敦煌社邑文书中的特殊量词》(2008)、王亚丽《敦煌古医籍中的名量词》(2010)、《敦煌医籍中的借用名量词》(2011)、敏春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饮食量词训释》(2010)等,以及硕士论文何琴《英藏敦煌文献(S10-S522)量词研究》(2011)、杨帆《英藏敦煌契约、社邑文书名量词研究》(2012)等。

(四)量词个案研究

量词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对某一特殊量词的语源、历时发展、语法功能及其适用范围等情况的探讨。对于隋唐五代量词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隋唐五代时期新兴的量词或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的量词,也包括这一时代独具特点的特殊量词。

“人”在以往量词研究中往往多有争议,其名词性始终不强,虽然刘世儒(1965)、王绍新(1992)等诸多学者都将其置于量词一类,也仍有诸多学者不承认其量词性质,这也说明其名词性较强。范崇高《名量词“人”示例》(2003)一文,举出唐代文献中“人”用于“数+量+名”结构中的几例,说明“人”在特定历史阶段

^① 敦煌文书之主体出自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非地下发掘的文献,但按照学术界惯例仍归入出土文献资料之中。

有发展为典型量词的可能。王绍新(2005)在《试论“人”的量词属性》一文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探讨了隋唐五代时期量词“人”的属性问题,并从分布、语法化、语用、替换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王绍新《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1989)一文则是在洪诚对唐代以前量词“个”的发展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到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展演变;李建平、张显成《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2009)也对这一时期泛指量词“个”和“枚”的兴替有所考察与研究。

敏春芳《敦煌社邑文书量词事、筮辨考》(2005)对敦煌文献中的两个特殊量词进行考辨,但其论证都还有可商榷之处。对于“筮”,赵家栋、董志翘(2012)已经根据图版指出该字其实是“茎”的俗讹字,汉语史上并不存在量词“筮”。对于“事”,则是唐代的常见量词,刘世儒(1965)认为“事”始终没有发展成为正规的量词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敏文仅仅根据敦煌文书认为“事”相当于量词“把”,并认为其语源为“小篆像手持一物之形”,其实量词“事”在唐五代文献衣物疏等文献中非常常见,相当于“件”,详参第二章。

郑邵琳《从唐石刻看量词“事”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2013)则对唐代石刻材料中量词“事”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事”在唐代才真正确立了量词的属性,是唐代一个新兴的量词,该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其被量词“件”替换的历程。金桂桃《唐至清的量词“件”》(2006)首先考察了唐代及以前量词“件”的语源及其发展,并进一步梳理了量词“件”的历时发展。

其他研究还有陈玉冬《隋唐五代量词的语义特征》(1998),硕士学位论文有游黎《唐五代量词研究》(2002)等。此外,历时的量词研究如唐钰明《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1990)、郭攀《古汉语“数(量)名”二语序形式二论》(2001)、吴福祥等《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2006)、姚振武《〈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读后》(2008)等数量表示法研究,以及游汝杰《汉语量词“个”语源辨析》(1985)、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998)、孟繁杰、李如龙《量词“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2010)、《量词“片”的语法化》(2011)等个案研究,李讷、石毓智《句子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与量词语法化的动因》(1998)、蒋颖《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2009)、王绍新《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2010)等量词语法化的研究,都涉及了隋唐五代的量词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总体来看,对隋唐五代时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量词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所涉及的只是众多传世文献中的很少一部分,对该时代量词的总体面貌有待全面考察。



二、隋唐五代量词研究的展望

目前,隋唐五代量词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诸多局限,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选题视角有待拓展。目前成果多为专书、专题研究,急需进一步系统的、全面的断代史研究,明确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的数量、语法功能等基本问题,对于隋唐时代量词的语法化程度的研究仍有待展开与深入;其他问题,如这一时期汉语量词兴替及其动因的研究也还远远不够。

其二,语料使用有待深入分析与拓展。目前研究的语料范围多局限于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尤其集中于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方面,有待将二者有机结合进行互证,并进一步与其他语言的相关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很多重要语料仍未能全面考察,传世文献如《全唐文》《全唐诗》等大型文献材料,出土文献如碑刻文献、买地券、造像题记等文献中的量词研究有待全面展开。

其三,研究方法有待更新。目前成果多为共时平面描写,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有待加强。量词的判定标准有待明确与统一,不同标准导致不同学者对同一文献量词数量、文本频率等参数的统计结果不一,甚至部分研究掺杂了一些名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本书在研究中对此也会进行说明。

三、隋唐五代量词的界定标准和分类

由于缺乏形式标记和形态变化以及词的多功能性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词类的划分一直汉语研究的难点。汉语的量词系统不是先有的,而是由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语法化而来的,因此量词与其源词类之间的界限往往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这也增加了量词界定的难度。

(一)名量词的界定

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对量词的界定是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1982:48)所提出的:“量词是能够放在数词后头的粘着词。”这一标准对于量词发展成成熟期的现代汉语无疑是适合的,但对古代汉语并不太适合,因为从先秦到隋唐五代时期,在数量表示法中数词和名词直接结合不用量词的情况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郭锡良(2005:36)则认为:“到了魏晋以后,名词变得不能直接同数词结合了,中间必须加上一个单位词;而单位词却总是直接同数词结合成数量结构,用作句子中的一个成分。这时单位词和一般名词的语法功能、语法作用有了明显的区别,才能说单位词已经从名词中分化出来,成了独立的一类词——量词。”一方面,正如郭

先生所言量词成为称数结构中的必要成分是量词系统成熟的标志,在量词系统仍未完全成熟的隋唐五代时期,量词并不一定会都出现在“Num + Cl + NP”结构中。另一方面,事实上魏晋以后到隋唐五代时期,数词同名词直接结合的情况在称数表示法中仍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系统的发展和特殊情况,我们在界定名量词时采用以下标准:

- A. 从形式上来看,是否处于“NP + Num + X”或“Num + X + NP”结构中 X 的位置;
- B. 从语义上来看,处于“NP + Num + X”或“Num + X + NP”结构中的“Num + X”是否表示其中 NP 的量;
- C. 当“NP + Num + X”或“Num + X + NP”结构中的 NP 省略时,如果可以根据文意补出 NP,则视为“NP + Num + X”或“Num + X + NP”结构;
- D. 当“Num + X”中 Num 为“一”而省略时,如果根据文意可以补足,则视为“一 + X”结构。

根据标准 A,我们可以将数量表示法和其他的语法结构区分开来;参照标准 B,我们把数量表示法中数词同名词、形容词等结合而与其他名词连用的情况区分开来;借助标准 C 则避免遗漏数词和量词结合时省略名词的情况;借助标准 D 则避免遗漏量词单独使用的情况。^①

(二) 动量词的界定

同名量词界定中的难点一样,动量词和源词之间也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二者之间并不具备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特别是量词萌芽期的上古汉语中的动量词系统更是如此,这也导致了学界对动量词产生时代认识的较大差异(李建平 2016b)。结合前人与时贤对古代汉语动量词的研究,根据隋唐五代动量词系统的特点,我们认为在动量词界定中应当综合语法功能和语义标准:

- A. 从形式上来看,是否处于“VP + Num + X”或“Num + X + VP”结构中 X 的位置;
- B. 从语义上来看,处于“VP + Num + X”或“Num + X + VP”结构中的“Num + X”是否表示其中 VP 的量;
- C. 动量词源词义的弱化,其适应对象更为广泛。

根据标准 A 我们可以将动量表示法和其他的语法结构区分开来;参照标准 B 我们把这一结构中非表量的其他结构排除出去;标准 C 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动量词语法化的程度。

^① 为保证量词发展史研究的系统性,并便于展开不同时代的历时比较,在我们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量词的系列研究中尽量采用统一的界定标准。